

## 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浅析\*

刘 翠 张建立

**提 要:** 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地藏信仰,经历了从贵族到庶民、从中央大寺院到地方寺院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广泛传播后,逐渐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一直影响至今。地藏信仰是中日两国间构建新时代文化认同的资源之一。通过考察日本早期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从地藏信仰的传播主体、受众情况及社会功能等方面总结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特点,不仅有助于准确了解日本早期地藏信仰的情况,而且也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国民感情,有效促进中日两国间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认同,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刘翠,文学博士,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 奈良期 平安前期 地藏信仰 经疏 造像

日本全国各地大小佛寺林立,其中供奉的佛菩萨多不胜数。对日本民众而言,诸多佛菩萨中最具亲和力的,大概非地藏菩萨莫属了。因为在日本佛寺不分宗派都会供奉地藏菩萨,而且供奉地藏菩萨的场所也是不拘一格,寺院堂舍内、露天庭院中,以及山林间的小路旁,乃至民众生活区域的大街小巷旁,几乎随处可见被民众虔诚供奉的造像大小不一的地藏菩萨。这种扎根日本民众日常生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地藏信仰,很早便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真锅广济和速水侑是较早着手于日本地藏信仰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真锅广济的研究涉及地藏经疏、造像、相关古典文学作品、民俗等方面,可谓奠定了日本地藏信仰研究的基础。<sup>①</sup>速水侑则在关注早期地藏信仰传入的同时,考察了地藏信仰在日本古代贵族社会及民众社会的发展。<sup>②</sup>然而,这两位学者分别将8世纪传入日本的《地藏经》《地藏菩萨经》主观推定为10世纪才出现于中国的《地藏菩萨本愿经》<sup>③</sup>。这一有待商榷的研判影响深远,其后有关地藏经疏的认识多是默认了两位的推定,不再见对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地藏经疏的考证,这显然不利于准确理解日本早期地藏信仰情况。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地藏信仰,经历了从贵族到庶民、从中央大寺院到地方寺院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广

泛传播后,逐渐融入日本民众日常生活,发展成了一种超越佛教宗派界限、跨越社会阶层、深入民心的普遍信仰,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地藏信仰是中日两国间构建新时代文化认同的资源之一。我国学者也对此有所关注,如张总、尹富等在其著作中介绍了日本地藏相关经典的研究状况以及日韩地藏信仰的基本情况。<sup>④</sup>

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相关地藏经疏无疑是日本地藏信仰发展的主要经典依据,但既有研究对奈良时代(710—794)传入日本的地藏经疏缺乏严谨的考证。本文拟在中日学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日本早期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从地藏信仰的传播主体、受众情况及社会功能等方面总结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特点,以期能够修正日本学界对地藏经典研判及评价方面出现的不当之处,为深化中日地藏信仰比较研究,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国民感情,有效促进中日两国间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认同提供一些学理支撑。

### 一、奈良、平安前期流行地藏诸经考

以地藏为主题的经典,最为主要的是“地藏三经”,即《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其中,《十轮经》有新旧两种译

本,即《大方广十轮经》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大方广十轮经》(8卷)已佚译者姓名,译经时代亦不详,载于北凉佛经目录。《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10卷)由玄奘永徽二年(651)译出。新译旧译虽各有千秋,但内容基本一致,作为正经历来地位稳固。《占察善恶业报经》题为隋代外国沙门菩提灯所译,但直至武周时才作为真经编入正录中。《地藏菩萨本愿经》题为实叉难陀(652—710)所译,但因诞生于10世纪的中国,实伪托实叉难陀译出。地藏三经以外,还有唐时译出的《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地藏菩萨仪轨》等,以及后世在中国撰述的《预修十王生七经》等。

8世纪中叶以后,相关地藏经疏如《十轮经》(两种译本)、《十轮经抄》(2卷)、《大乘十轮经疏》(3卷)、《地藏经》(1卷)、《地藏菩萨经》(2卷)、《占察善恶业报经》(2卷)、《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卷)等开始出现在日本正仓院写经文书中。天平七年(735)归国的日本僧人玄昉(?—746)从中国带回五千余卷佛经,自此以后日本写经经目增多。地藏经典的写经概是发生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出现在《大日本古文书》写经文书中的经疏,按照首次确切出现顺序的先后整理为表1,该表依据奈良时代古文书全文检索数据库(日文:奈良時代古文书フ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整理而成。

表1 相关地藏经及疏抄

经疏名	卷数	初出年份	《大日本古文书》卷一页
《大乘十轮经》	10卷	天平五年(733)	7—8
《占察善恶业报经》	2卷	天平八年(736)	7—70
《大方广十轮经》	8卷	天平九年(737)	7—71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10卷	天平十年(738)	7—178
《地藏菩萨经》	2卷	天平十年(738)	7—211
《十轮经》	10卷	天平十年(738)	7—216
《大乘地藏十轮经》	10卷	天平十一年(739)	7—87
《地藏经》	1卷	天平十九年(747)	9—354
《大乘十轮经疏》	3卷	天平十九年(747)	2—709
《十轮经抄》	2卷	天平十九年(747)	9—592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	1卷	天平胜宝五年(753)	12—467
《十轮经》	8卷	天平胜宝七年(755)	4—66

首先,暂且不看经疏名一栏中名为《十轮经》的经典。由卷数一栏中《大乘十轮经》与《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大乘地藏十轮经》皆为10卷,可判断此三者为同一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为佛经全称,该经的简称为《大乘十轮经》《大乘地藏十轮经》,有时亦简称为《十轮经》,即表中为10卷的《十轮经》。8卷的《大方广十轮经》有时也会简称为《十轮经》,即表中为8卷的《十轮经》。本文将此两种新旧译本统称为《十轮经》。据上表可知,除《十轮经》外,地藏相关经典还有《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经》《地藏经》《地藏菩萨陀罗尼经》,疏抄有《大乘十轮经疏》《十轮经抄》两种。

地藏经典是地藏信仰得以发展的依据,为正确把握不同阶段地藏信仰发展的特点,则有必要正确把握经典传入日本的时期。奠定日本早期地

藏信仰研究基础的真锅广济及速水侑分别将上表中的《地藏经》《地藏菩萨经》推定为10世纪才出现于中国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两人的观点并无客观论据支撑。以下本文参考中国方面的相关研究,修正日本学者在经典评价及经典推定上存在的不妥,并尝试对《地藏经》《地藏菩萨经》为何经作出具体判定。

(一)《占察善恶业报经》与《地藏菩萨经》

《占察善恶业报经》上下两卷,亦简称为《占察经》。上卷主要讲述化导众生时可用木轮法占察善恶,下卷仅是借地藏之口讲述到达一实境界的方法。上卷中对地藏的性格有如下阐述:

①(序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此善男子(地藏——笔者注)发心已来,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久已能度萨婆若海,功德满足,但依本愿自在力故,权巧现化,影应

十方。虽复普游一切刹土，常起功业，而于五浊恶世，化益偏厚，亦依本愿力所熏习故，及因众生应受化业故也。彼从十一劫来，庄严此世界，成熟众生。是故在斯会中，身相端庄，威德殊胜，唯除如来，无能过者。

②又于此世界所有化业，唯除遍吉、观世音等，诸大菩萨皆不能及。以是菩萨本誓愿力，速满众生一切所求，能灭众生一切重罪，除诸障碍，现得安隐。

③又是菩萨名为善安慰说者，所谓巧演深法，能善开导初学发意求大乘者，令不怯弱。以如是等因缘，于此世界，众生渴仰，受化得度。是故我今令彼说之。<sup>⑤</sup>

如引文中②处所示，该经称除遍吉（普贤）、观世音等大菩萨外，其他菩萨皆不及地藏菩萨。据此，真锅广济表示作为地藏经典其价值应在于将地藏菩萨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但该经并未如此，将其作为“地藏三经”之一着实让人费解。<sup>⑥</sup>速水侑则以下述典故为依据，称《占察善恶业报经》在日本很少作为地藏经典被论述，反而成为自誓受戒的根据。<sup>⑦</sup>即鉴真东渡日本时带去具足戒，但一些日本僧人反对从鉴真处重新受戒。此时僧人们搬出的证据便是《占察善恶业报经》中承认自誓受戒的部分，即“自誓而受菩萨律仪三种戒聚，则名具获波罗提木叉，出家之戒名为比丘比丘尼，即应推求声闻律藏及菩萨所习摩德勒伽藏”<sup>⑧</sup>；承认僧人在佛前自誓受戒。除速水侑指出的上述小插曲外，10世纪后期源信（942—1017）著《往生要集》中亦引用到《占察善恶业报经》下卷的内容，即“《占察经》下卷云：‘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不乱，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国，善根增长，速成不退’”<sup>⑨</sup>，用于举例说明诸多佛经中多以念佛为往生业。如此看来，《占察善恶业报经》与地藏的关系似乎确实并不紧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同时可找到很多证据，证明该经在宣扬地藏信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源信造立的地藏像中纳入了《占察善恶业报经》<sup>⑩</sup>；仁和寺僧人济进僧都（1025—1115）天仁二年（1109）著成的《持念地藏菩萨殊要抄》（1卷）分十条介绍了地藏的功德，其间多次引用《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内容（包括上述引文中的①②③）<sup>⑪</sup>；觉禅（1143—？）著《觉禅抄》“地藏上”“地藏下”解说地藏时亦引用该经内容<sup>⑫</sup>；文明十五年（1483）名为继存

的僧人抄写了享德二年（1454）问世的观智院藏《地藏菩萨灵验绘词》，继存在文后详细列出自己曾探寻及抄写过的地藏经典、仪轨、故事等，其中明确将该经作为地藏经典列出。<sup>⑬</sup>由以上诸多具体事例可知，《占察善恶业报经》在日本整个中世很明确地被视为地藏经典之一。因此速水侑认为该经在日本很少被视为地藏经典的言说不当。综上所述，《占察善恶业报经》在作为地藏经典发挥作用的同时，其内容的其他方面亦经常受到关注，比如上述自誓受戒及强调念佛之处。

与《占察善恶业报经》相关的还有表1中的《地藏菩萨经》。以往的研究将写经文书中出现的《地藏菩萨经》视为《地藏菩萨本愿经》。例如，石田茂作将《地藏经》《地藏菩萨经》两者皆看作《地藏菩萨本愿经》<sup>⑭</sup>。速水侑虽未提及《地藏经》，但认同石田茂作的看法，同样将《地藏菩萨经》看作《地藏菩萨本愿经》，<sup>⑮</sup>并在后年的著作中坚持了该推定<sup>⑯</sup>。但两人的推定并未举出具体证据。据以下两点可以证明其推定不当：

第一，据中国方面的研究，《地藏菩萨本愿经》出现的上限时间为10世纪后晋天福年间（935—944），下限时间为开宝七年（974）。这就说明该经不可能传入奈良时代（710—794）的日本。有关《地藏菩萨本愿经》在中国产生的上限时间，既往研究主要依据宋朝僧人常谨撰写的《地藏菩萨像灵验记》（989）第29话“清泰寺沙门智祐感应地藏记”展开了论述。故事记载西印度僧人智祐后晋天福年中携地藏十王画像，以及《本愿功德经》梵夹即梵文版《地藏菩萨本愿经》来中土。据智祐称，其携地藏十王画像渡险河时遇一沙门，该沙门实为地藏化身。沙门将梵文版《地藏菩萨本愿经》交付于智祐，故事最后亦将智祐视为地藏化身。据尹富称，“根据这条资料，太史文认为《本愿经》的产生时代应在后晋天福年中（936—944），显然他比较相信常谨的叙述。而庄明兴则以这则资料来证明地藏信仰与十王信仰的结合是因为《本愿经》提供了神话的来源之故，从而认为《本愿经》的产生，应该前推至晚唐”<sup>⑰</sup>。然而，尹富认为庄明兴的说法难以解释恒安《续贞元录》（945）中未录入该经等情况。尹富自身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产生的上限时间为后晋天福年中。首先，在论述经典的合法性即经典非伪经时，梵文版早于汉译版才合乎情理。若梵文版天福年中才传至本土，则汉译本的产生不会早于天福年间。否则该

故事存在明显漏洞。其次，保大三年（945）恒安编撰的《续贞元录》中未收录《地藏菩萨本愿经》，而《续贞元录》为恒安历谒名山、寻僧问法、遍览经藏后编撰的佛经目录，若本愿经当时已问世则漏编的可能性极小。加之，南唐李璟在位期间（943—961）朝中大臣多推行“十斋日”，而《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典中最全面引述并积极推行十斋日的经典，因此亦不存在在该经已问世而被禁止编入经录的可能。考虑到为既有事物赋予权威时，阐述事物起源的故事、传说往往会将事物产生的时期推前，尹富的推定可谓妥当。有关《地藏菩萨本愿经》产生的下限时间，尹富推定为974年。<sup>⑧</sup>尹富指出敦煌出土的《地藏菩萨经十斋日》这一标题中出现的“地藏菩萨经”指《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之所以出现在标题的命名中，是因为该经吸收了早已流行的十斋日，为十斋日提供了新的经典依据，才使地藏的名号出现于命名中。而《地藏菩萨经十斋日》其中一个写本的跋文记载“甲戌年三十日三界寺僧沙弥法定师记耳”。据尹富介绍，三界寺位于敦煌莫高窟第16窟前，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管辖的十七寺之一。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攻打敦煌，三界寺及其藏经被烧，905年张善才主持重建。五代时期，张道真搜集各寺古坏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从时间上来看，跋文中的甲戌年只可能是914年或974年。又因《地藏菩萨本愿经》出现的上限时间为后晋天福年间（936—944），此处的甲戌年应为974年。尹富据此将《地藏菩萨本愿经》出现的下限时间精确至974年。

第二，紧随《占察善恶业报经》之后著成的《净土论》（618—906）及《华严经探玄记》（643—712）中，对《地藏菩萨经》分别有如下引用：“又如《地藏菩萨经》说：‘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土，应随世界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不乱，决定得生彼佛净土，善根增长，速成不退’”<sup>⑨</sup>，“又准《地藏菩萨经》三时劝加劝，菩萨速成正觉”<sup>⑩</sup>。而《占察善恶业报经》中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容，分别为“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不乱，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国，善根增长，速获不退”<sup>⑪</sup>。“次应复发劝请之愿，愿令十方一切菩萨未成正觉者，愿速成正觉。”<sup>⑫</sup>这说明《地藏菩萨经》很可能是《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别称。唐朝僧人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

（730）中的记载则证实了这一猜测。《开元释教录》载：“《占察善恶业报经》二卷‘云出《六根聚经》，亦云《大乘实义经》，亦名《地藏菩萨经》，亦直云《占察经》’右一部二卷，其本见在。”<sup>⑬</sup>此处《地藏菩萨经》作为《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别称之一被明确列举出来。因此，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在中国出现的时期以及《地藏菩萨经》为《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别称之一为依据，已可断定奈良时代写经文书中的《地藏菩萨经》不等同于《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介绍地藏性格的最重要经典之一，在地藏信仰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规定地藏是释迦灭度后弥勒下生前救度众生的菩萨，我们对地藏的基本认识，例如，地藏作为无佛世界的救世主有着“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愿皆是源自此经。既然《地藏菩萨本愿经》出现于10世纪的中国而不可能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就意味着《地藏菩萨本愿经》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的地藏并不具有该经描述的性格。

## （二）《地藏经》与《地藏菩萨陀罗尼经》

日本方面的研究在对《地藏经》为何经的推定上同样存在不妥。由上述表1可知《地藏经》为1卷。真锅广济早年对《地藏经》1卷是否等同于《地藏菩萨本愿经》2卷存疑，但稍后的著述中称凭直觉倾向于认为《地藏经》1卷等同于《地藏菩萨本愿经》2卷，2卷作1卷概为翻刻错误。<sup>⑭</sup>然如上所述，《地藏菩萨本愿经》不可能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这也就意味着《地藏经》不可能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即便不考虑《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产生时期，由以下正仓院文书及平安初期《菅家文草》中的记载亦能否定真锅广济的结论。首先，在奈良时代古文书全文检索数据库中以“地藏经”为关键词检索，便会发现“《地藏经》一卷”的记载出现在6封不同的文书中，即《大日本古文书编年文书》第3卷“经纸出纳帐”、同第11卷“经疏间校帐”、同第12卷“写书所请问写笔墨帐”“间经并疏文造装潢帐”、同第13卷“造东寺纸笔墨轴等充帐”“造东寺司造经并菩萨像注文”，而6封不同的文书皆记错的可能性很小。尤其其中记录了校正事宜的“经疏间校帐”明确记载“《七佛所说经》四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卷、《地藏经》一卷，用纸百十四张<一校上马甘、二校饱田石足>”<sup>⑮</sup>。意即《地藏经》1卷经过了两位校正员的确认，因此在卷数上写错的可能性极小。由《地藏经》1卷

出现在 6 封不同的文书以及已经过两位校正人员的确认可知,《地藏经》本就是 1 卷的经典而非翻刻时将 2 卷误写为 1 卷。其次,平安前期《菅家文草》收录的发愿文中亦有为亡妻追福奉写“金字《法华经》一部八卷、《无量义经》、《观普贤经》、《阿弥陀经》、《地藏经》、《般若心经》各一卷”<sup>⑧</sup>的记载。因此,即便仅由以上正仓院文书及《菅家文草》中的记载亦能断定 1 卷的《地藏经》不等同于 2 卷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两者为两种不同的经典。上述(一)中已论证《地藏菩萨经》不等同于《地藏菩萨本愿经》。加之《地藏经》为 1 卷,《地藏菩萨经》为 2 卷,我们进而可以断定《地藏经》《地藏菩萨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三者名称虽相近,但各为不同的经典。因《地藏菩萨本愿经》非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经典,对其内容及传入日本时期的考察拟另稿讨论。

那么奈良时期的《地藏经》究竟是指哪部佛经呢?鉴于以下理由,本文认为《地藏经》1 卷为《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 卷的简称。首先,据表 1 可知,仅有《地藏经》与《地藏菩萨陀罗尼经》为 1 卷佛经。其次,据上述 6 封文书的记载可知,《地藏经》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七佛所说经》(或《七佛所说神咒经》或《七佛神咒经》)共同抄写。其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显而易见为陀罗尼类经典,《七佛所说经》全称为《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亦为陀罗尼类经典。由此可知,与《地藏经》一起抄写的《无垢净光大陀螺尼经》《七佛所说经》皆为陀罗尼类经典,这就表明《地藏经》也极有可能为陀罗尼类经典。

再者,镰仓初期《觉禅抄》“地藏上”引用了名为《地藏经》的佛经,引用之处为“(地藏——笔者注)登一切智山之顶,住随顺诸佛之国”<sup>⑨</sup>。而《地藏菩萨陀罗尼经》中确有与此相近的内容,即“(地藏——笔者注)以师子光三昧登一切智山须弥之顶,摧伏异学,成就众生。在所佛国悉皆止住,随诸佛国入智三昧”<sup>⑩</sup>。综合考虑以上三点,本文认为《地藏经》1 卷为《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 卷的简称。

《地藏菩萨陀罗尼经》现今作为密教经典,收录在《大藏经》密教部。事实上《地藏菩萨陀罗尼经》除最后两段外,其余内容全部照抄《大方广十轮经》“序品”及“诸天女问四大品”第一段。该经中包含 63 句陀罗尼咒,最后两段分别阐述地藏陀罗尼咒的威力及毗沙门天誓愿诵

咒语之人。经中称该咒“广大无量三界受乐”,受持该咒则“一切诸恶悉皆消除”。尹富指出“咒陀罗尼在原始密教中处于中心地位。持诵陀罗尼咒不仅可以忆念持法,而且可以招神呼鬼,去病消罪,祈求平安,甚至可以往生佛国,证道成佛”<sup>⑪</sup>。尹富同时以《地藏菩萨陀罗尼经》既不见于中土任何经录亦不见于日本僧人的求法目录为依据,推测《地藏菩萨陀罗尼经》可能是日本人杜撰的经典。<sup>⑫</sup>但如上所述,该经出现在正仓院写经文书中,地藏经典的写经发生在玄昉带回中国大量佛经之后,这似乎暗示该经亦源自中国。该经未载于经录或许与其内容绝大部分与《大方广十轮经》重复相关。

以上总览了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相关地藏经及疏,并修正了日本方面的既往研究在对经典判定及评价上存在的的天。经过梳理与考证可知,奈良时代有三种以地藏为主角的经典传入日本,即《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经》。其中,《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别称之一为《地藏菩萨经》,其在日本中世明确被视为地藏经典,而非先前研究所说的该经在日本一般不作为地藏经典被论述。《地藏经》1 卷为《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 卷的简称,该经与其他两部陀罗尼类佛经共同抄写,强调了陀罗尼咒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地藏相关经疏虽陆续传入日本并被抄写,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随即被理解和消化吸收。速水侑指出地藏经典的写经频率及相关经疏数量远不及观音经典,“优婆塞贡进解”记载了当时想要出家之人需学习的经典,但其中不包括地藏经典,说明在奈良时代地藏尚未受到僧侣阶层的重视。<sup>⑬</sup>那么,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地藏经疏在平安前期又有怎样的传播呢?进入平安前期,大藏经不再局限于中央寺院,地方寺院亦开始藏有大藏经。例如“筑前国观世音寺资材帐”记载九州的寺院观世音寺中藏有大藏经。不仅如此,与大藏经并列,单独记载有地藏经典《十轮经》。<sup>⑭</sup>随着大藏经写经的发展,从大藏经中地藏相关经疏的抄写情况考察平安时代的地藏信仰几近不可能。而且如前所述,即便可确认有地藏经典的写经,也未必意味着其内容随之被接受和理解。即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考察地藏经典出现的场合,来窥探地藏经典在平安前期的传播与发展。

平安前期,地藏经典开始明确出现在贵族社会的追福法会中。《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嘉祥三

年(850)五月九日记载仁明天皇去世后举办七七御斋会时,新造立一体地藏像并在像前诵读《金光明经》及《地藏经》;前文已提及的平安前期《菅家文草》收录的发愿文亦记载周忌追福法会时,为亡妻奉写《地藏经》《观普贤经》《阿弥陀经》等经典。前文已论述《地藏经》为《地藏菩萨陀罗尼经》的简称,《地藏经》出现在追福法会中,体现出对陀罗尼咒威力的尊崇。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地藏信仰发展赖以为基础的部分地藏经典已于奈良时代传入日本,最初地藏经典作为大规模写经的一环被抄写。进入平安前期,地藏经典不再局限于大规模写经之中,单独流通的地藏经典,开始与其他经典一道出现在贵族社会的追福法会中。

## 二、奈良、平安前期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

日本早期的地藏信仰还表现在地藏造像方面。从奈良时代的文献史料上可知的可信度较高的地藏造像仅有如下几例。第一例造像为东大寺讲堂的地藏像,该像由光明后天平十九年(747)发愿造立。《东大寺要录》记载“虚空藏菩萨像一躯<立高一丈并彩色璫在讲堂>、地藏菩萨像一躯<立高一丈>右,皇后御愿,以天平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始作”<sup>③</sup>;第二例造像为兴福寺地藏堂的地藏像。记录了奈良时代兴福寺具体情况的《兴福寺流记》及《兴福寺伽蓝缘起》分别记载:“同东院地藏堂<宽仁二年六月廿一日

夜,雷火烧失了。>右,宝龟二年,奉为赠太政大臣藤原永手,其子所造立也。”<sup>④</sup>“地藏堂,光仁天皇宝龟二<辛亥>年御草创。”<sup>⑤</sup>即地藏堂是宝龟二年藤原永手之子为其亡父藤原永手而建。平安初期的《圣宝僧正传》记载圣宝僧正经奏上重新修造了兴福寺地藏堂,同时修理了高一丈六尺(约2.4m)的阿弥陀像、地藏像及罗汉像。宝龟二年(771)建立的兴福寺地藏堂是从史料上可得知的最早的地藏堂。不幸的是,该地藏堂于宽仁元年(1017)六月二十三日与东金堂一起毁于雷电引起的火灾。地藏造像的另外两例为《兴福寺流记》所引《延历记》中的记载,即“地藏菩萨一躯、罗汉像捨(拾)躯<以上彩色>(中略)地藏像一躯<高并座基六尺、在光彩也>”<sup>⑥</sup>。该两例的造像时间仅可知为《延历记》问世的延历年间(782—805),不能得知具体年限。换言之,奈良时代的地藏造像仅可知2至4例。

从现存史料来看,奈良时代的地藏造像目前仅可知以上几例,且集中在中央寺院。据井上光贞调查,奈良时代年代明确的阿弥陀造像有16例<sup>⑦</sup>。据速水侑调查,奈良时代的观音造像有46例<sup>⑧</sup>。与此相比,奈良时代的地藏造像可谓少之又少。

进入平安前期,地藏造像的记录增多。现将文献中出现的直至10世纪中期的地藏造像的相关文献记录整理成表2,该表主要参考速水侑的研究整理而成。<sup>⑨</sup>

表2 8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地藏造像相关记录年表

年代	相关内容	出现场合	文献依据
延历年间(782—806)	1. 彩色地藏菩萨一体 2. 彩色地藏像一体	兴福寺	《兴福寺丛书第一》大日本佛教全书123卷《兴福寺流记》
嘉祥三年(850)	新造地藏菩萨像一体	仁明天皇 七七御斋会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嘉祥三年五月九日条
贞观十三年(871)	地藏菩萨等身像一体	安祥寺	《平安遗文》164号、“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
贞观十五年(873)	地藏菩萨像、虚空藏菩萨像各一体	广隆寺	《平安遗文》175号、“广隆寺资财交替实录帐”
延喜四年(904)	奉造观音、地藏两菩萨像	前太皇太后宫职藏人助 子女王往年宿愿	筒井俊英校订《东大寺要录》(373页)
延喜九年(909)	1. 于现光寺造一丈六尺弥勒和一丈地藏菩萨 2. 于兴福寺,经奏上重新修造地藏堂。修理一丈六尺的阿弥陀像及地藏菩萨和罗汉像	现光寺 兴福寺	《续群书类丛》第8辑下第213卷《圣宝僧正传》

续表2

年 代	相关内容	出现场合	文献依据
天庆七年 (944)	奉造地藏菩萨像一体	周忌法会	《大日本史料》天庆七年九月九日条所引《愿文集》
天庆八年 (945)	彩色地藏像	多武峰 阿弥陀堂	《大日本史料》天庆八年杂载所引《多武峰略记》千满注文

由表2可知,地藏造像不仅出现在寺院的堂舍中,同时多出现在贵族社会的追福法会(御斋会、忌日法会)中。此外,据久野健称,现今保存下来的平安初期的地藏造像较多。表2中广隆寺讲堂的地藏像,以及三重县朝田寺、福岛县会津胜常寺等寺院的地藏像皆为平安初期的造像。<sup>④</sup>据其同一研究还可知如下信息:从造像的地域分布来看,地藏造像已不再像奈良时代那般仅限于中央寺院;关东地区与关西地区的地藏造像在形态上明显不同,地藏造像出现了形态上的多样化。<sup>⑤</sup>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奈良时代地藏造像数量极少且集中在中央的大寺院。进入平安时期,文献中出现地藏造像的记载增多。地藏造像已不再局限于中央大寺院,新造的地藏像不仅出现在寺院中,亦常出现于贵族社会举办的追福法会。

### 三、奈良、平安前期地藏信仰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奈良、平安前期的相关经疏及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该时期的日本地藏信仰具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从传播者来看,奈良时代及平安前期还未出现以僧侣或寺院为主体主动宣传地藏信仰的情况。奈良时代地藏相关经疏传入日本,其时作为大规模写经的一环,在中央寺院抄写地藏经典。随着大藏经的传播与发展,平安前期地方寺院亦开始藏有大藏经,使得其中的地藏经典亦出现在地方寺院。然地藏相关经疏陆续传入日本并被抄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随即被理解和消化吸收。奈良时代地藏经典的写经频率及相关经疏数量远不及观音经典,同时地藏尚未在奈良时代的僧侣阶层受到重视。加之平安前期出现地藏经典的文献亦不多,可以说地藏经典在弘扬地藏信仰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总体而言,奈良时代及平安前期未出现僧侣阶层的信仰者,地藏经典在弘扬信仰方面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现阶段未形成有体系的信仰传播系统。

第二,从受众情况来看,奈良及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仅停留在寺院及贵族阶层内部。该时

期,不论是地藏经典的抄经还是地藏的造像,皆出现在寺院及少部分贵族阶层。地藏信仰尚未传播至普通民众,也就未出现大规模的信众群体。而时至日本中世,地藏信仰不再仅局限于贵族阶层,自上而下广泛传播,广受僧侣、贵族、武士、普通民众阶层的信仰,发展成为一种超越社会阶层的普遍信仰。同时出现了固定信众定期举办或者参与地藏法会活动。即便如今,在日本东北的青森县、宫城县仍存在着以女性为主要参与者的固定讲会活动,参与者聚在一起念唱经文,供养地藏。津轻地区祭祀地藏的习俗甚至被认定为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关西地区现存的“地藏盆”节日<sup>⑥</sup>,更是体现了孩子们对地藏相关民俗活动的参与。可以说,地藏信仰现今仍以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传播与延续着。

第三,从地藏信仰的功能来看,地藏在为故人的追福中扮演重要角色。奈良时代兴福寺地藏堂的建立由藤原永手之子为其追福而建,平安前期《地藏经》及地藏造像多出现在贵族的追福法会中。由这些事实可知,日本早期的地藏信仰带有强烈的追福色彩,而不具备来世信仰的性格,即后世可见的地藏将人引导至净土的性格。关于早期地藏信仰之所以不具备来世信仰的性格,速水侑认为奈良时期律令社会处于繁荣时期,比起对现世持悲观态度的净土思想,贵族阶层更注重现世利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地藏信仰难以带有来世色彩。<sup>⑦</sup>

又因奈良、平安前期强调地藏地狱救赎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尚未产生传入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亦看不到地藏的地狱救赎机能。

综上所述,地藏在对故人的追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带有浓厚的追福色彩。事实上,地藏信仰的追福功德,可谓贯穿整个地藏信仰的发展史。后世僧侣、贵族、武士及普通民众的追福法会中皆可看到地藏登场。法会时或是描绘地藏画像,或是造立地藏像,或是抄写地藏经典,皆体现出信仰者对地藏追福中所起作用的肯定。现今我们在日本大街

小巷看到的小型地藏像的安放地点，有些曾是事故现场附近。通过安放地藏像，以为事故中丧生的死者追福，表达生者对故人的追思。另外，寺院中渐渐多起来的“水子地藏”<sup>④</sup>，目的同样是为未能出生便死去的婴儿或夭折的婴幼儿追福。可以说地藏的存在给生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安慰，地藏信仰的追福功能一直延续至今。

### 结 语

本文通过介绍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概观了日本奈良及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奈良时代，地藏相关经疏传入日本并在平安前期有所发展，为后世地藏信仰的产生奠定了经典基础。本文通过论证判定《地藏经》1卷为《地藏菩萨陀罗尼经》1卷的简称，《地藏菩萨经》2卷则为《占察善恶业报经》2卷的别称，进而指出正仓院写经文书中出现的《地藏经》《地藏菩萨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为3种不同的经典。本文同时否定了既往研究对《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定位，证明了其作为地藏经典具有稳固地位。

通过对奈良及平安前期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的梳理考察可知日本早期地藏信仰的特点有如下三点：从传播者来看，奈良时代及平安前期还未出现以僧侣或寺院为主体主动宣传地藏信仰的情况；从受众情况来看，地藏信仰仅停留在寺院及贵族阶层内部；从地藏信仰的功能来看，地藏在为故人的追福中扮演重要角色。

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除表现在上述经疏及地藏造像两方面外，还表现在出现了一则地藏登场的感应故事、国家层面的“地藏悔过”法会，以及僧侣在参加法会时使用的草稿中出现了地藏的少许叙述等。关于此些方面，拟起稿再论。

（责任编辑：月灯）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日间文化认同问题研究”（2021RBSB03）阶段性成果。

- ① 真鍋廣濟著：『地藏説話の研究』，京都：顕真学苑出版部，1932年；真鍋廣濟著：『地藏尊の研究』，和歌山：吉田書院，1972年；真鍋廣濟著：『地藏菩薩の研究』，京都：三密堂書店，1987年。
- ② 速水侑：「日本古代貴族における地藏信仰の展開」，『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969年第22号17-1；速水侑著：『地藏信仰』，東京：塙書房，2012年。
- ③ 真鍋廣濟著：『地藏尊の研究』，和歌山：吉田書院，1972年，24頁；速水侑：「日本古代貴族における地藏信仰の展開」，『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969年第22号17-1。
- ④ 张总著：《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尹富著：《中国地藏信仰研究》，

- 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
- ⑤⑧⑨⑩⑪《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7册第902、904、908—909、904页。
- ⑫ 真鍋廣濟著：『地藏菩薩の研究』，京都：三密堂書店，1987年，107—108頁。
- ⑬⑭ 速水侑著：『地藏信仰』，東京：塙書房，2012年，17、36頁。
- ⑮ 比叡山專修院、叡山学院編：『恵心僧都全集（第一）』，京都：思文閣出版，1984年，209頁。
- ⑯ 奥健夫：「源信造立の地藏菩薩像に関する新資料」，『佛教藝術：Arts buddica』，2003年第269号。
- ⑰ 翻刻文收录于堀内規之著『濟暹教学の研究：院政期真言密教の諸問題』（東京：ノンブル，2009年）。
- ⑱⑲ 佛書刊行會編：『覺禪鈔第四』大日本仏教全書48卷，東京：佛書刊行會，1916年，184、207、185頁。
- ⑳ “自幼年皈此尊之間，經軌驗記等尋求之處，一兩年內所書寫（中略）占察經上下二卷。”觀智院藏『地藏菩薩靈驗繪詞』翻刻文收录于真鍋廣濟著『地藏菩薩の研究』（京都：三密堂書店，1987年）及真鍋廣濟、梅津次郎編『地藏靈驗記繪詞集』（東京：古典文庫，1957年）。
- ㉑ 石田茂作著：『写經より見たる奈良朝仏教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82年，83頁。
- ㉒⑳㉓㉔㉕ 速水侑：「日本古代貴族における地藏信仰の展開」，『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969年第22号17-1。
- ㉖⑳㉗㉘ 尹富著：《中国地藏信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73、335、234、235頁。
- ㉙ 《大藏经》第47册第103頁。
- ㉚ 《大藏经》第35册第254頁。
- ㉛ 《大藏经》第55册第551頁。
- ㉜ 真鍋廣濟著：『地藏説話の研究』，京都：顕真学苑出版部，1932年，10頁；真鍋廣濟著：『地藏尊の研究』，和歌山：吉田書院，1972年，24頁。
- ㉝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十一（追加五）』，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31頁。
- ㉞ 川口久雄校注：『菅原文草』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2，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604頁。
- ㉟ 《大藏经》第20册第657頁。
- ㊱ 『平安遺文』，194号。
- ㊲ 筒井英俊校訂：『東大寺要録』，大阪：全国書房，1944年，100頁。
- ㊳ 谷本啓：「校訂『興福寺流記（一）』」，『奈良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2006年第11号。
- ㊴ 塙保己一編：『続群書類従』第二十七輯下，東京：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84年，114頁。
- ㊵ 仏書刊行會編：『興福寺叢書第一』大日本仏教全書123卷，東京：仏書刊行會，1915年，12頁。
- ㊶ 井上光貞著：『日本浄土教成立史の研究』井上光貞著作集7卷，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22—24頁。另外还有一例为天平五年以前的造像，不能得知具体年月，若加上此例则为17例。
- ㊷④① 久野健：「地藏菩薩像の変遷」，桜井徳太郎編：『地藏信仰』，東京：雄山閣出版，1988年，19—32頁。
- ㊸ “地藏盆”指通过供养地藏来祈求儿童健康成长的风俗习惯，多见于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现今多于阳历8月23、24日举办。
- ㊹ 水子指因人工流产等原因而未能生存下来的婴儿及出生后不久便死亡的婴儿。水子地藏专为这些婴儿追福。